

《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2010）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1 (2010), 119-141

越南潘佩珠与日本、中国之深厚关系

——以潘佩珠对于西方建国英雄事迹的吸收与转化为例

陈益源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罗景文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

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是越南近代爱国志士，他的一生为唤起越南人民的爱国精神而努力，对于越南的独立自主功不可没。1905年他初到日本，先后结识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章太炎（1869-1936）等人，也与日本维新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犬养毅（1855-1932）等人有所联系。之后，他多次往来于中日两国，并秘密联系国内反法分子进行革命工作。他同时组织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史称“东游运动”，以争取外援、寻求救国之道。在这段期间，潘佩珠不断吸收新知，大量阅读中日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所著之书籍，或是听取他们的建言，开拓了自己对于世界局势、东亚情势的眼界。潘佩珠将其吸收之所得，转而着书立说，他的作品不但是越南或是东亚其他国家（如韩国）有志之士藉以了解世界变化、刺激思想的来源，更成为后继士人汲引挪用的对象。由此可知，潘佩珠的作品不仅与日本、中国有深厚的关系，更突显出东亚文化不断交流之复杂面貌。透过对潘佩珠作品与日本、中国之关系的探讨，相信更能进一步理解潘佩珠及其作品与近代东亚历史变革、政治局势，以及文化思潮等多方交会、互动的情形。

关键词：越南 潘佩珠 新书 梁启超 建国英雄 玛志尼 华盛顿

1 前 言

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1867-1940）是越南近代爱国志士，原名潘文珊，号巢南，又号是汉。1867年出生于义安河南坛县一个乡学教师家庭。自幼跟随其父（潘文谱，生卒年不详）学习儒学经典，精通汉文，曾中解元。1885年他决心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殖民，曾聚集六十多名同学组成“试生军”保卫国家。从1900年起，在全国各地联系爱国者，进行抗法运动。1904年5月成立“越南维新会”，其宗旨是“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1905年初到日本，先后结识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章太炎（1869-1936）等人，受梁、孙两人的影响极深，也与日本维新大臣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1838-1922）、犬养毅（いぬかいつよし，1855-1932）等人有所联系。之后，他多次来往于日本、中国之间，并秘密联系国内反法分子，在中日两国进行革命工作，并组织青年学生赴日本留学，史称“东游运动”。因为他和其他志士的努力，至1907年已有二百人到日本留学，但在1909年，潘氏与畿外侯强抵（Cường Đê，1882-1951）因反法运动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来，他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1912年2月于广州成立“越南光复会”，并担任总理，其政治方针为“驱逐法贼、恢复越南，成立越南共和国”。1913年在广州被捕入狱，至1917年获释。自此往来于北京、杭州、上海、广州及云贵间，间至朝鲜、日本和泰国，推动越南的革命运动。1924年潘氏于广州解散光复会，成立“越南国民党”。1925年5月11日，他在途经上海时，为法国特务绑架，被

押解回越，软禁于顺化御津，至1940年去世。¹

潘佩珠与历来越南传统士人同样都是自幼学习中国经典，所以他对于汉文化的熟悉自是不在话下，其作品与汉文化的深厚关系也是不言可喻。因此，我们若是以此为线索，追索他的作品与汉文化的关系，便显得徒费工夫，也无法呈现潘佩珠身处在世变之际，与东亚诸国文化多元交流时的特殊面貌。对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风云动荡的局势，严复（1853-1921）曾有生动的形象：“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²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国与东亚诸国，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与威胁，纷纷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有所变革，寻找种种对策以图强。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以致于变革的内容、方式与速度也有所不同。

不过，值得注意的共同趋势是，中国与东亚诸国的开明士大夫或是知识分子，都试图将西方现代化国家做为革新的楷模，努力探求西欧诸国得以“富国强兵”、“开化文明”的原因。其中又以日本得其先机，放弃锁国政策与幕府政体，大力实施明治维新，经过甲午及日俄两次战役，成为东亚首强，跻身世界列强之国的行列。因此，激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对日本维新的学习，吸引大量的开明士大夫或是知识分子前往日本。³而他们藉

1 详见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潘佩珠年表》，编号VHC1725，此稿本未标明页码。以下所引《潘佩珠年表》即据此本引用，为免脚注繁琐，不一一注明。另外，关于《潘佩珠年表》之法、英、日等诸版本之介绍，可参见陈庆浩：《从新发现潘佩珠（1867-1940）的汉文小说谈汉文化整体研究》，收入王三庆、陈益源主编，《2007东亚汉文学与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乐学书局，2007，页2。至于《潘佩珠年表》之越文译本甚多，其中较为重要者如（越）章收编辑之《潘佩珠全集》第6册《潘佩珠年表》，河内：顺化出版社、东西方文学语言中心，2000年。

2 严复，《严复集·论世变之亟》，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

3 关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情况，可参见（日）实藤惠秀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页92-280。

以吸收新知、开拓视野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阅读日本的新学书籍，或是直接阅读日文原籍，或是透过中文的转译而得知内容。经过多次转手，西学/新学思想与内容得以传播至东亚诸国，并在各国发挥影响力。潘佩珠便是身兼吸收者与传播者的重要角色，也是越南较早“开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局势的先行者。因此，我们不再从潘佩珠与中国经典文化的关系入手，而是选择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角度便是从1889年中国戊戌变法前后，潘佩珠对于新知识、新思维的接触、吸收、转化与传播看起，藉此观察其作品与中国、日本的深厚关系。

潘佩珠曾在其自传《潘佩珠年表》中提到，在他出洋之前接触了徐继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王韬（1828-1897）的《普法战纪》，以及蔡尔康（1851-1921）的《中东战纪本末》，使他“略晓寰海竞争之情状，国亡种灭之悲惨，益大有激刺。”此外，他也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魂》、《戊戌政变记》、以及《新民丛报》上的两三篇作品。不少研究者都关注到，潘佩珠阅读这些从中国传来的“新书”而获得的启蒙。⁴

然而，这些“新书”中的某些思维与概念，并非完全来自于中国士人或知识分子，其中也包含日本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梁启超对于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吸收与引用。⁵更重要的

4 如Willian J.Duiker“Phan Boi Chau: 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1, No.1 (Nov.1971), pp.78-79.

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运动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对外认识》，东京：岩南堂书店，1993，页130-137。

5 相关论述甚多，不胜枚举。较重要者有：周佳荣《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思潮》，收入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页61-81；（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是，当时的思想世界已是多元思潮不断交流、冲突的复杂面貌，一向的新思潮新知识往往是东亚诸国，尤其是中日两国思想的不断互动、多方激荡之后所呈现的结果，随时有可能翻新出奇，其间关系颇为纠葛复杂，也增加了分析的困难度。因此，我们不能把一新思维或新知识的出现单纯类归为某一文化的影响。

为了能厘清潘佩珠作品与中国、日本两个的深厚关系，我们应该思考这些新思维、新知识传播到潘佩珠手中的途径与过程，以及他日后汲引运用的状态。不过，潘佩珠所吸收的思想多元繁富，为了方便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将选择潘佩珠对于西方建国英雄形象的理解与转化做为考察的对象，试图了解潘氏与中日思潮的深厚关系。而潘佩珠最常提到的两位建国英雄便是意大利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与美国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因此，我们将集中探讨潘佩珠对这两位西方建国英雄事迹的吸收、接受与转化的情形上。而不可忽略的是，潘佩珠又是如何将他所接触、所吸收的新知新学，透过“再生产”（reproduce）的方式回馈给东亚诸国，其传播与影响的过程和结果，本文也将一并讨论。

2 潘佩珠与意大利建国三杰之玛志尼

年轻时的潘佩珠尚武任侠，他回忆他在十岁时（1876）便模仿义静绅豪起义，作平西之戏，自承其个性“喜动好奇”。他在十七岁（1883）的时候，受到抗法义兵的影响，“豪兴勃发”，撰《平西收北文檄》，希望能发挥影响力。十九岁那年，潘佩珠还与同学准备组成“试生军”，然尚未成形便因法兵镇压而瓦解。日后，他发现“欲为英雄”，应该要“潜有所养”、“积有所谋”，于是阴结绿林豪侠、勤王余党，以图起义，成就英雄之事。由此可知，在他的血液里潜藏着破坏既有体制的反叛性格与抗争个性，因此他将起义或是暴动作为抗法的主要方式，就不难

理解。

潘佩珠在出洋之前，写了一篇《时世与英雄》，文中提到国家强盛兴亡与否，关键在于“其国之有英雄与否”，假使人人皆为英雄，必无野蛮卑弱之国。他接着又说：

夫立五洲争竞之场，正宜露我头角，况时穷势蹙，国破君亡，死至目前，亡悬颈后，真宜投袂而起，奋义同仇，生亦快死亦快。⁶

除了潘佩珠自身的性格，时代的影响也是造成他具有任侠尚武特质的重要原因。此时，他不仅呼吁人民群起抗法，期待未来有抗法的英雄，而他自己也以“英雄”自许。而这种任侠尚武的英雄主义亦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颇为相近。⁷因此，当潘佩珠阅读或是接触到外国建国英雄或是政治领袖的言行事迹，他在同感共鸣之外，更产生崇拜敬仰之心，并认为这些外国的建国英雄可以做为越南争取独立的典范，这些英雄人物便成为他笔下号召人民革命抗法的思想资源。

6 潘佩珠：《时世与英雄》，章收编辑：《潘佩珠全集》第1册，页351、353。

7 龚鹏程《侠骨与柔情——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一文曾云：“晚清社会文化变迁之巨，是人所共知的。在这个文恬武嬉、内忧外患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觉对时代有责任，所以也就更向往正义之实现，也更期待英雄，或是自己愿意成为拯救时代的英雄。对于各种现存的社会体制，更是力予批判，意欲‘冲决网罗’，以获得个体的自由和群体的解放。在这种存在的基础上，他们的性格往往就倾向于侠。”收入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月），页143-165。引文见页144。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尚侠性质，亦可参见陈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收入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页275-319。

潘佩珠曾在自传中提到，他认识意大利（即義大利，下文统一为意大利）革命家玛志尼的经过，他说：

初予访梁公时，公方修《意大利三杰传》，出以示予。予极慕玛志尼之为人，而玛传中“教育与暴动并行”一言，尤予所心醉。是故，一方面鼓动学生出洋；又一方面，励国人以革命之思想与其行动。

引文中的《意大利三杰传》即是梁启超所撰之《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早在潘氏初识玛志尼之前，这篇文章已在1902年6月至12月间的《新民丛刊》连载。意大利建国三杰指的是玛志尼、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以及加富尔（Camillo B. Cavour, 1810-1861）等三人。玛志尼于1831年创立少年意大利党（即青年意大利党），发起青年爱国运动，鼓吹意大利的统一。此举获得加里波的的起义响应，可惜遭受挫败。日后，由萨的尼亚王国的首相加富尔，继承玛志尼所提倡意大利独立运动，加富尔运用其灵活的外交手腕以取得法、英支持，并痛陈奥大利（即奥地利）帝国的暴行，同时得到加里波的的军事援助，因而完成南北意大利大部分的统一。意大利的完全统一虽然并非在他们三人的手上完成，但他们所引领的独立潮流势不可挡，意大利终于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完成统一。⁸

梁启超曾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发端》提到他之所以为三杰立传的理由：

8 详见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收入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11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欧洲近数百年，其建国之历史，可歌可泣可记载者，不一而足。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国前之情状，与吾中国今日如一辙者，莫如意大利。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⁹

梁启超认为意大利建国之前的情势与当时的中国颇为相似，因此，叙述意大利三杰建国的历史，可以做为中国效法的楷模。他的看法实际上是得自於日人的啟發，《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大部分是根據平田久（ひらたひさし，1872-1923）編譯的《伊太利建國三傑》（日本民友社1892年版）與松村介石（まつむらかいせき，1859-1939）的《嘉米祿·加富爾》（《太陽》第4卷第1-2號，1898年1-2月），並參考其他書籍補充而成的。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便将近代意大利与近代日本相提并论，而松村介石甚至认为近代中国与近代意大利亦有相同之处。¹⁰虽然梁启超在不少观点上承袭日人，但与日人比较日意两国现代化过程有所不同的是，他极力推崇玛志尼，¹¹期待中国人能向他学习爱国的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所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其实是日中多方思想交流杂揉的作品。潘佩珠阅读此传时，直接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极为仰慕玛志尼之为人与爱国精神，并从玛

9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专集》第11册，页1-2。

10 详见（日）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入（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页252-264。

11 梁启超说：“意大利建国之功，首必推玛志尼，天下公论也。……前此无玛志尼，则虽有百加富尔，而大功终不可就；后此无加富尔，则夫受玛志尼之感化者，岂患无人起以获其实也。故造意大利者三杰也，而造彼二杰者玛志尼也。至是而玛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见《饮冰室专集》第11册，页25。

志尼的革命理念中，找到从事越南独立革命运动的方针——“教育与暴动并行”，日后潘佩珠在建立维新会时，将人员分为两组，他在《潘佩珠年表》里提到：“一为和平派，专注于学堂演说宣传等事；一为激烈派，专注于运动军事，筹备武装实行之举动。”显然就是受到玛志尼这句话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可忽略的是，潘佩珠也透过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间接地受到日本思潮的影响，藉以了解世界局势的变化，并找到日后行动的对策。

3 潘佩珠与华盛顿

这种多元思想交流互动的情形，也同样出现在人们对于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之形象的书写上。回顾华盛顿在东亚诸国的接受史，最先是由西方传教士将华盛顿之言行事迹带入中国，在1838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正月号上便有《华盛顿言行最略》一文。此外，有不少传教士在译介美国历史时，也都提到了华盛顿。而自1842年起，华盛顿就正式进入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如魏源（1792-1857）《海国图志》、梁廷枏（1796-1861）《合省国说》、徐继畲（1795-1873）《瀛寰志略》、蒋敦复（1808-1867）《嘯古堂文集·海外两异人传》、黎汝谦（1852-1909）与蔡国昭《华盛顿传》等书中都记录或是描述到华盛顿的言行。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在他的笔下，奠定了华盛顿“异国尧舜”的形象，日后中国关于华盛顿形象的书写大多据此，而不断地复制征引或是添枝加叶。

自1855年起，华盛顿也逐渐为日人所知，如大槻恒輔（おおつきつねすけ，1818 - 1857）《遠西紀略》、北川直養（きたがわなおやす）《亞墨利加渡海日記》、鈴木彌堅（すずきひさしけん）《華盛頓軍記》、岡千仞（おかせんじん，1833-1914）與河野通之（こうのみちゆき，1842-1916）《米利堅志》、岡本監

輔（おかもとかんすけ，1839-1904）《萬國史記》等書先後著譯華盛頓生平資料或是傳記。¹²在中日两国士人与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之下，东亚诸国在19世纪初期兴起了编译华盛顿传记的热潮。¹³

而潘佩珠又是如何得知华盛顿的事迹呢？他并没有在自传或是其他著作里交待他阅读华盛顿传记的来源与过程。不过，潘佩珠在出洋之前便已阅读了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略知华盛顿言行之一二了。不过，真正带给潘佩珠影响的，应该是黎汝谦与蔡国昭编译的《华盛顿传》。原因在于潘佩珠曾着有《崇拜佳人·读华盛顿传有感书贻同胞》一文，¹⁴放眼当时仅有黎、蔡两人所著译的传记名称与潘佩珠所读（“华盛顿传”）相符。因此在这里，我们先介绍黎、蔡两人编译《华盛顿传》的经过，以及此书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影响。

黎汝谦久闻华盛顿大名，但苦无可以查阅其生平事迹的著作，于是在1882年他担任“日本神户理事官”时，请“翻译官”蔡国昭购买“近代合众国学士耳汾·华盛顿（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所著的《华盛顿全传》（*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黎氏在确定该书的质量之后，遂命蔡国昭翻译。三年之后，此书始成，再经过黎汝谦五次整理校正，于1886年出版。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回响。直到1896年，汪康年（1860-1911）与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从创刊号连载此书至第

12 详见邹振环：《“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系谱的重建—华盛顿和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历史文献》第9辑，2005年11月，页394-402；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页11-45。

13 详见邹振环，《“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系谱的重建—华盛顿和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页400-402。

14 潘佩珠，《崇拜佳人·读华盛顿传有感书贻同胞》，章收编辑，《潘佩珠全集》第2册，页485-487。

十一期（更名为《华盛顿全传》），以及1897年此书出版单行本后，才发挥其影响力，不久便出现了盗版的情形。此书也成为梁启超了解华盛顿生平，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的重要“思想资源”，多次在其著作中提及此书。¹⁵而潘佩珠也可能是透过梁启超的介绍，而知晓此书，这或许是潘佩珠接触《华盛顿传》途径之一。

潘佩珠于1907年5月东京出版了《崇拜佳人》，而在十年前，1897年8月出版的《实学报》第一期，也刊载了汪荣宝这位青年阅读《华盛顿传》之后的心得——《书《华盛顿传》后》。¹⁶历史的巧合，得以让我们进一步比较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所关注的问题。潘佩珠曾提到他之所以撰《崇拜佳人》一书的原因：

念最近无名之英雄，有最当纪念而为我所知者也，凡数人，其一曰高胜，其一曰队合，其一曰管宝，短刀压阵，杀贼将名没片（扇），以报高公胜之仇。予捃拾各事之始末，略分为传，颜曰“崇拜佳人”。

这里的“佳人”指的就是越南抗法之壮士英雄，他们的抗法义行与慷慨牺牲值得后人敬仰崇拜。因此，潘佩珠希望透过为英雄立传的机会，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向这些英雄志士学习，为积极抗法而努力。华盛顿虽非越南人，但他带领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的英雄事迹，足以为后世被殖民者的表率，因此潘佩珠说：

15 此段论述参考邹振环，《“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系谱的重建——华盛顿和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页397-398。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页90-93。

16 汪荣宝，《书《华盛顿传》后》，《实学报》第1期，1897年8月（台北文海出版社据光绪23年8月版影印，1996年1月），页59-62。

今五洲万国所公认为世界之第一伟大者必曰华盛顿，吾侪兄弟所以心醉而愿学者亦莫若华盛顿。磨剑修枪日遍于东西，嬉风戏云日演于宇宙，华盛顿之价值日愈高，吾同胞之脑海中无日不注此潮流矣。¹⁷

他在叙述完华盛顿抗英的生平之后，便感叹“呜呼惨矣！我国民岂无一华盛顿者乎？”话虽如此，潘佩珠还是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人民若能习于兵事，将是同胞成为华盛顿的“绝好机缘”。原因在于人们习于军事训练，将有助于未来应战，并可激发爱国爱同胞之情操，久与法人周旋对抗，便能熟知法人之行为模式。如此一来，要成为越南的华盛顿便易如反掌。他最后呼吁“同胞乎！愿为华盛顿否？敢为华盛顿否？能为华盛顿否？”¹⁸潘佩珠借着华盛顿的事迹来激励同胞的民族情感，要大家勇敢地推翻法国殖民统治。

而汪荣宝认为华盛顿所提倡的总统选举制度，可以和上古时代尧舜禅让的理想政治相媲美。这样的制度可以得到“四善”，而避免专制独裁的“五病”。他从美国的政治制度，反观中国的专制统治，认为中国君主不像美国总统是由议院选举产生，而且至多只能连任一次，任期最多八年，所以中国难以回到上古时代“揖让之元风”。但是，中国可以透过议会和学校的设置，去除专制统治的弊病，所以他说：“学校不立，智民不生；议院不

17 潘佩珠，《崇拜佳人·读华盛顿传有感书贻同胞》，《潘佩珠全集》第2册，页485。

18 引文见潘佩珠，《崇拜佳人·读华盛顿传有感书贻同胞》，《潘佩珠全集》第2册，页485-487。

兴，公义不出。”¹⁹

潘佩珠从《华盛顿传》里，读出了被殖民者应该勇于追求独立的意义。所以，他不断鼓动人民的民族情感，号召同胞救亡图存，他希望人人可以做越南的华盛顿，人人都是越南的华盛顿。而汪荣宝却在同一本《华盛顿传》里，读出了不同的意义。他在比较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之后，思考改进中国专制政体的方法，发现设置学校与议会便是可行的途径。两人所阅读的文本相同，但他们的读后心得却大相径庭，原因在于两人所面对的国家处境有所不同。

近代中国有志之士与知识分子深感于中国积弱不振，便呼吁朝廷在政治体制上有所改革。大约在1880年代，王韬（1828-1897）与郑观应（1842-1922）等人便已提出君主立宪与设立议会制度的看法。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宣告自强运动的失败，士人要求改革的声浪达到高峰，遂有康有为率领梁启超等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此一要求朝廷变法的举动，史称“公车上书”。²⁰ 设置议会在当时是士人之间极为热门的政治议题，在这个风潮之下，汪荣宝与不少士人如崔国因（1831-1909）、陈炽（1855-1900）、汤震（1857-1917）、宋恕（1862-1910）等人都是从华盛顿的言行事迹里，进一步思考议会制度在中国实施的问题。²¹ 每

19 详见汪荣宝，《书《华盛顿传》后》，页59-62，引文见页61。关于汪荣宝《书《华盛顿传》后》一文的探讨尚可参见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页93-94。

20 详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页307-308、312-313。

21 关于崔国因等人如何从华盛顿的言行事迹，读出“议会”之见解的讨论，详见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页82-96。

个人的见解或有不同，但无不与当时中国的时代思潮共进同行。

而潘佩珠面对的是殖民者剥削统治，他所考虑的问题并非改革政治体制，而是如何能脱离殖民者统治获得独立。因此，他提出了“排法复越”的口号。²² 所以当他见到《华盛顿传》时，便选取华盛顿带领同胞勇于抗英革命的形象，做为他鼓动人民的“思想资源”。由于华盛顿的英雄形象有助潘佩珠之革命理念的阐述与推广，因此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如《南游鸿爪录》提到革命应以“启民智振民气为宗旨”，“民智开，则华盛顿可以脱英而独立矣”，²³ 意思是一旦启发民智，人人都可以成为抵抗殖民者的华盛顿。又如《真将军》是潘佩珠记叙抗法名将黄花探（Hoàng Hoa Thám, 1885-1913）生平事迹的作品，其中亦提到华盛顿。潘佩珠认为假使黄花探生于美国，必不让华盛顿专美于前，同样可以成为名垂万世的英雄，因此“吾于是不哀吾国之无人”，²⁴ 但只怕人民不够团结，没有“万万亿亿”之华盛顿，共赴国难，一心抗法。

再回到汪荣宝与潘佩珠两人所面对之不同国家处境的讨论上，“议院说”虽然是当时中国改革士人的热门议题，但另有一

22 潘佩珠与潘周楨（Phan Châu Trinh, 1872-1926）两人都是越南近代民族运动的先驱，但两人在政治思想与手段上差异甚大。有别于潘佩珠的革命暴动、排法复越的想法，潘周楨提出了“倚法排君”的想法。希望透过体制内的改革，推翻越南的专制统治。潘佩珠在其自传提到两人观点的不同，他说：“自是一连十余日，公（指潘周楨）与予反复议论，意见极相左。公则欲翻倒君主，以为扶植民权之基础；予则先摧法贼，俟我国独立之后，即能言及其他。予所谋利用君主之意，公极反对；而公所谋尊民排君之意，予亦极不赞成。”关于二潘政治思想之差异的讨论，可参见梁志明，《潘佩珠与潘周楨比较研究》，收入梁志明，《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257-273。

23 潘佩珠，《南游鸿爪录》，《兵事杂志》第31期，1916年11月，页10。

24 潘佩珠，《真将军》，《兵事杂志》第41期，1917年9月，页9。

股不满清廷而寻求体制外改革的风潮悄然成形，这便是孙中山（1866-1925）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而在潘佩珠之前，中国革命党人也从华盛顿的言行事迹里找到他们鼓动革命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笔下，华盛顿成为带领人民迈向自由民主的革命楷模。²⁵华盛顿的事迹甚至与其他具有类似象征意义的典范人物，一同成为革命党人灌输革命思想的教材。²⁶就这一点来说，潘佩珠对华盛顿言行的理解，是与中国革命运动的风潮紧密连结的。

4 潘佩珠作品对东亚近代史的回馈与影响

上文我们以潘佩珠对于西方建国英雄形象的理解为例，讨论了他接触、吸收新学新知的途径与过程，说明他与中国、日本两国的深厚关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潘佩珠又是如何将他所接触、所吸收的新知新学，透过“再生产”（reproduce）的方式回馈给东亚诸国。其作品之传播与影响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潘佩珠在出洋之前，阅读了梁启超作品而得知维新思想，对他极为仰慕；出洋之后结识梁启超，一方面透过梁氏的介绍，向日人大隈重信、犬养毅求援，一方面听取梁氏的建议。梁启超当时建议潘佩珠：

25 详见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页104-128。

26 冯自由《记东京大同学校及余更名自由之经过》一文曾云：“高等大同学校充满革命空气。所取教材有卢骚《民约论》、《法国大革命史》、摩西《出埃及记》、《华盛顿传》、《英国革命史》诸书。学生林钊圭……及余等三十余人皆言大志大，各以摩西、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卢骚、福禄特尔、克林威尔诸豪杰自许。”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97-98。

予殫竭心慮，現時只有二策為能貢獻於公者。其一多以劇烈悲痛之文字，摹寫貴國淪亡之病狀，與法人滅人國種之毒謀，宣布於世界，或能喚起世界之輿論，為君等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國，或以文書寄回國內，鼓動多數青年出洋遊學，藉為興民氣開民智之基礎，又一策也。（《潘佩珠年表》）

在梁启超的建议和协助之下，潘佩珠完成了生平第一本被出版的著作——《越南亡国史》，这本书对内可以唤醒民族情感、激励同胞抗法，对外则成为引起国际舆论的最佳宣传品。因此，我们可说梁启超是对潘佩珠出洋前后这一段时间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这本由潘佩珠所著，由梁启超撰《叙》、《例言》、《越南小志》²⁷等文所组成的《越南亡国史》，长期以来被误认为全是梁启超所著，已有不少学者为文指正。²⁸虽然，此书的著作权长期被人们所误认，但潘佩珠和他的著作，以及越南亡国的历史，却也

27 部分学者对于作者署“新民丛报社社员编”的《越南小志》，是否为梁启超所著仍存有疑惑，详见徐善福，《关于《越南亡国史》的作者问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3期（总第55期），页35-37；周佳荣，《梁启超与《越南亡国史》——近代中越关系史上的一段插曲》，收入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页82-93。

28 多位学者已指出梁启超着、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4月），以及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中法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将《越南亡国史》的作者误植为梁启超，是造成《越南亡国史》作者遭到误认的主要原因。详见上述徐善福、周佳荣两人之文，以及黄国安，《〈越南亡国史〉是梁启超撰写吗？》，《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页36-38。但至今仍仍有学者将《越南亡国史》视为梁启超所著，详见（韩）辛胜夏，《梁启超对韩国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444-456。

透过梁启超的影响力更为东亚诸国志士与知识分子所知。

二十世纪初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殖民，东亚各国兴起了编译“亡国史”的热潮，其中又以中国为最。编译“亡国史”的目的在于透过了解他国之亡的历史，做为本国救亡图存的借鉴。²⁹在潘佩珠撰着《越南亡国史》之前，梁启超已于1904年撰写《朝鲜亡国史略》一书。因此，当他和潘佩珠笔谈时，得知越南被法国殖民的惨况之后，便积极鼓励潘佩珠以“剧烈悲痛之文字”描写越南亡国的原因与历史。

正因为梁启超为《越南亡国史》撰写序言和简介，并为之出版，再加上梁启超本身也是这波编译世界各国亡国史之风潮的主导者之一，³⁰他曾说：“近世忧愤之士，往往悬拟亡国惨状，播诸诗歌、托诸说部，冀以耸天下之耳目。”³¹因此，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越南亡国史》的作者。然而，这不但没有减损潘佩珠为越南撰写《越南亡国史》的历史意义，反而更扩大了其影响力，让东亚诸国志士知晓法国殖民越南时的暴行与苛政，并可做为东亚各国避免覆亡的历史借镜，梁启超在《自由书·记越南亡人之言》一文里便提到：

夫不见一年来之日本之所以待朝鲜耶！今战事且未集，而第二越南之现象，已将见矣。同一日本而待台湾与待朝鲜，何以异焉，其故可思也。越南且然，

29 详见邹振环，《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韩国学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页325-354。

30 梁启超曾着译了《天国新法论》、《埃及国债史》、《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吞并朝鲜记》等书。

31 梁启超，《自由书·记越南亡人之言》，《饮冰室专集》第2册，页109。

朝鲜且然，况乃其可畏什伯于越南、朝鲜者，又如何矣！³²

梁启超从这位越南亡人（即潘佩珠）的话里，体悟到东亚各个被殖民国家所面临的处境极为相似。因此，朝鲜对于越南，越南之于朝鲜便有相互映照的历史意义，两国因亡国而产生连结。再加上梁启超在当时的名声，以及他曾着译有《朝鲜亡国史略》一书，所以当1905年《越南亡国史》一出版时，立刻引起了朝鲜有志之士的注意。1906年便有朝鲜重要的翻译家玄采（1856-1925）翻译《越南亡国史》出版，1907年更出现了两种译本，1908年亦有再版。³³《越南亡国史》不仅感动了朝鲜的读者，更被收录在当时的小学教科书《幼年必读》之中，让它成为朝鲜家喻户晓的启蒙教材，“向国民介绍了外国的建国英雄的传记和独立运动、革命运动的历史，为提高国民的独立意识和历史意识进行了努力。”³⁴《越南亡国史》在这时已经变成朝鲜士人汲引运用的“思想资源”，潘佩珠也从思想的吸收者成为传播者。从《越南亡国史》对于唤起朝鲜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意识来看，东亚各个被殖民国实已成为一命运的共同体，彼此休戚与共、相濡以沫，这证明了潘佩珠及其作品对于东亚近代史有一定的回馈与影响。

32 梁启超，《自由书·记越南亡人之言》，《饮冰室专集》第2册，页110。

33 关于《越南亡国史》在朝鲜翻译和出版之状况，详见邹振环，《梁启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国史》及其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播与影响》，《韩国学研究论丛》第1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页308-318。

34 引文引自（韩）姜万吉着、贺剑城等译，《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页296。并可参见邹振环，《梁启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国史》及其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播与影响》，页315-316；（韩）辛胜夏：《梁启超对韩国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页444-456。

而除了《越南亡国史》之外，潘佩珠的其他作品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如赵伸（字直斋，1875-1930）对于潘佩珠刊登在《云南杂志》上的《海外血书》³⁵提出他的看法，他说：

越南人巢南子作海外血书，以告其国人，悲痛恳切，……呜呼，将为越南而尚未为越南者，其亦可以知所鉴矣。或曰：“是不能为巢南子咎也，是实巢南子前辈之所谓君所谓臣所谓一股社会有以貽之戚也。”是说也，余观于吾国今日之一切情形而亦信之。³⁶

赵伸认为越南亡国的历史可做为其他将沦为被殖民之国的借镜，文中所说“将为越南而尚未为越南者”指的其实是中国，当时的中国被列强所割据占领，成为半殖民国家，若再不振衰起弊的话，中国迟早会成为下一个越南。有人认为越南亡国是越南人和越南社会自己招致的结果，而赵伸却认为中国今日之积弱不振，不也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自种其因、自食恶果。此外，赵伸也提出他阅读潘佩珠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和泪贡言》³⁷的“读后感”：

35 潘佩珠，《海外血书》，原刊《云南杂志》第4号，1907年2月。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页700-713。（越）章收据此编入《潘佩珠全集》第2册，页405-434。另附有《海外血书》抄本，见页557-600。

36 直斋，《越南人之海外血书·前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页700。

37 潘佩珠，《和泪贡言》，原刊《云南杂志》第4号，1907年7月。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页719-722。（越）章收据此编入《潘佩珠全集》第2册，页510-515。

右文为安南志士服国丧者所作，词旨哀切，为余所最亲爱之友□□□挂号寄来者。到时适该国志士□□□君亦在余座，相与读之。读毕，余谓之曰：“……八股为彼族消磨英雄之毒剂，贵国人偏好作此态，且惟恐作之不工；科举为彼族羁縻英雄之毒剂，贵国人偏堕此术。吾怪其堕之而不悟，甚至杀戮同种以媚异种，是心亡之尤甚者也。有此三病，扁鹊复生，亦难为力。”□□□君似以予为恶口者，乃应之曰：“诚然，然足下试思，贵国人竟无此病乎？如有其一，或竟有其三，则固未可作如此说也。”予为之默然，自悔失言。出版时因附录之以志予过。直斋氏记。³⁸

赵仲看出潘佩珠欲藉《和泪贡言》针砭越南人三病：一是“国亡而不自知其亡”的“心亡”，一是热衷科举八股，一是“杀戮同种以媚异种”。在赵仲感叹越南人的弊病时，同座越南友人也提醒赵仲，中国人同样也是百弊丛生而尚不自知，由彼观己，中国不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清廷不也是腐败无能。此文不仅可以唤起越南人亡国亡种的危机感，也警醒了仍在昏聩的中国人。而潘佩珠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哀越吊滇》³⁹，则从地理、历史、人种等面向强调越南、云南两地关系密切。当法人殖民越南之后，下一步便欲取得云南。从法人移都于东京—河内，以及经营滇越铁路，便可知法帝国欲殖民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的野

38 直斋，《越南人之海外血书·前言》，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页722。

39 潘佩珠，《哀越吊滇》，原刊《云南杂志》第6号，1907年7月。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页715-719。（越）章收据此编入《潘佩珠全集》第2册，页526-533。

心。因此他说：“悲莫悲于吾族之越南，而忽忽焉俱吾死也；悲莫悲于吾邻之云南，而岌岌焉后吾亡也。”⁴⁰清楚地说明了越南、云南两地唇齿相依、休戚相关的关系，他的分析和提醒对于中越两国，乃至对东亚诸国的有志之士与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5 结 语

潘佩珠在出洋前后不断吸收新知新学，阅读许多中、日思想家及政治活动家所著之书籍，或是听取他们的建言，得以“开眼见世界”，开拓了自己对于世界局势、东亚情势的眼界。虽然，我们在这里只选择他对于西方建国英雄形象的理解与转化做为考察的对象，试图了解他与中、日思潮的深厚关系。他对意大利玛志尼与美国华盛顿两位西方建国英雄事迹加以吸收、接受与转化，从中找到被殖民者应该勇于追求独立的意义，甚至找到进行革命运动的方针。日后，意大利玛志尼与美国华盛顿在他的笔下，便成为了鼓动民族情感，号召同胞救亡图存最好的“思想资源”。

潘佩珠将其吸收之所得，转而著书立说，透过“再生产”的方式回馈给东亚诸国。他的作品不但是越南或是东亚其他国家有志之士藉以了解世界变化、刺激思想的来源，更成为后继士人汲引挪用的对象。潘佩珠也从思想的吸收者成为传播者。而从他的作品唤起东亚诸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来看，东亚各个被殖民国实已成为一命运的共同体，这证明了潘佩珠及其作品对于东亚近代史的有一定的回馈与影响。由此可知，潘佩珠的作品不仅与日本、中国有深厚的关系，更突显出东亚文化不断交流之复杂面貌。

40 潘佩珠，《哀越吊滇》，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页715。

透过对潘佩珠作品与日本、中国之关系的探讨，相信能理解潘佩珠及其作品与近代东亚历史变革、政治局势，以及文化思潮等多方交会、互动的情形。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潘佩珠对于西方思想家和日本维新先驱思想的吸收、理解与再生产，以及在他思维之中“现代”与“传统”、“新思维”与“旧观念”之间复杂纠葛的关系。⁴¹

(责任编辑：祝家丰)

41 潘佩珠曾受过深厚的汉学训练，但他也接受西方新学新知的熏陶。因此，他如何调适、又如何选择去取、融会贯通两者，是颇为复杂的问题。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提到：“不论‘传统’与‘现代’都不是简单、静止或有同构型指涉的概念，传统本是一个不断演进、变化的存在，里面包含的思想、质素，复杂万端而且常常互相冲突。‘现代’亦复如是。更进一步，被笼统划归传统的思想或事物，很可能包含了现代的质素。而所谓的‘现代’，中间也可能有并不符合现代精神的元素。”更突显分析这个问题的错综复杂。关于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反思，详见 Benjamin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收入史华慈: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5-64。上述引文引自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化——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年代》，收入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143-144。

Phan Bội Châu's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China: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Independence Heroic
Incidents Into His Works

Chen Yi-Yuan Loh Ching W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1867-1940) was a Vietnamese patriot in modern times. He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arouse patriotic spirit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s, and had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Japan in 1905, he made acquaintance with Liang Qi Chao (1873-1929), Sun Yat Sen (1866-1925), Zhang Tai Yan (1869-1936) and oth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He was also in touch with Japanese Meiji Officials Ookuma Shigenobu (大隈重信1838-1922) and Inukai Tsuyoshi (犬養毅1855-1932). Since then, he traveled regularl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made secret contacts with anti-French activists in Vietnam to facilitate his revolutionary tasks. Meanwhile he organized "Eastern Journey Movement" and sent young students to further their study in Japan, so as to gain foreign assistance and look for ways to save his n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Phan Bội Chu was eager to acquire new knowledge. He read extensively on books written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thinkers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or listening to their advice, thus widen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world affairs and East Asian scenarios. He transformed the knowledge acquired into his writings. His works helped those Vietnamese and East Asian activists to understand trend of global changes, and as useful sources of knowledge which further stimulated their thinking. Hence, his writings not only manifest his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China, but more importantly, portray the intricate facade of cultur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n region. Research on Phan Bội Chu's works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China, would definite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 works, the many facets of intersecting and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cultural thinking, as well a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al scenarios of the East Asia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Vietnam Phan Bội Châu Liang Qi Chao hero of independence Giuseppe Mazzini George Washington